

我国当代人性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沈亚生 杨 琦

摘 要:我国近年的人性论研究出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为根据的人性论、结构层次人性论、“类哲学”的“双重生命”人性论、文化人性论、伦理本位的人性论等,虽然这些理论探索完全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观念,但是,相对于世界思想史上相关的前沿成果,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超越。因为对于人性不能做出一劳永逸的封闭性定义,所以,各种人性的研究理论,包括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人性论与社会历史观,两者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此消彼长。以现代哲学的视角来透视,人性问题完全可以作为人学或整个哲学学术的出发点或核心问题。

关键词:人性; 经典根据人性论; 结构层次人性论; 类哲学与双重生命人性论

作者简介:沈亚生,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杨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人性论是指关于人的本质和属性的理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性论研究一度是理论禁区。人性、人道、人权等人性论核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不仅没有任何位置,甚至是批判、扬弃的对象。马克思在早期著述中的确论及过人性和人道主义,当时以这种主要观点解读:那些关于人性的话语是马克思思想还不成熟的表现,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后提出的“对于人的理解”与其他西方哲学中的“抽象人性论”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要是用“人的本质”而非“人性”概念来阐述人的问题,并且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是以“现实中的个人”^①为基点。这种片面的看法,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其一,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虽与其他人性理论有所不同,却不是排斥“人性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的本性的论述,实际就是在讲人性问题;而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在关注人性的完善与实现。如果不能厘清这个问题,就会对人类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产生虚无主义的态度。其二,在马克思的许多论著,尤其是表述唯物史观的表层话语中,的确不再讲人性概念,而是更多地论说人的本质问题,但对于人的关切却始终如一。唯物史观在其理论出发点和最终价值导向上,倡导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指向于人的本质及其外向化的满足,实质就是在探讨人性问题。其三,如果将人性视作一个纯客观性的问题,这就必然会导向绝对主义、独断论。对人性的探讨只有处于一个多角度的、批判的、开放的模式下,才能在人类实践中不断展现新的内容。我国哲学家们在改革开放后,从不同层面和视角,阐明了各自的人性论观点。正是这种理论的撞击,推动我们达到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境界。

一、我国当代人性论研究中的几种代表性理论

(一)“经典根据论”和“人性结构层次理论”

我国的一些学者在人性论研究突破理论禁区后,推出了一个研究原则——研究人性问题,必须依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这代表着我国人性论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根据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黄楠森先生提出了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可以把人性区分为是由“人的属性”、“人的根本的共性”、“人的本质”三个层次构成。^①他认为,人性的理论是中西方文化所共有的,人的本质理论则是西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而这“三层次理论”可以说是认识人性问题的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真正把握人的存在及人性必须完整地理解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黄楠森先生对人性概念的层次区分,对于人性论的理论研究十分关键。因为一个哲学概念只有澄清了它的确切含义,才不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黄楠森先生在其主编的《人学原理》一书中,不仅发展了上述的人性三层次论,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应该区分为人的类本质、人的特殊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三个方面。生产、实践、自由自觉的活动都是指人的类本质;社会关系或阶级性都是指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群体的本质;使每个人成为唯一性存在的是个性本质。^②书中提出,人的本质有主体性、客观性和内在性三方面的结构。这三方面结构互相关联:自由是类本质的主体方面,社会历史性是类本质的客观方面。而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是在特定社会关系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从而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的存在物。它包括三个层次的规定:一般的类本质(生产劳动)、特殊的社会本质(社会关系)和个别的个人本质(独特个性)”。^③并且人的本质规定应是多方面规定的统一,“应是人类学规定和社会学规定的统一,是价值成分和客观成分的统一。只有这样,对人的本质规定才是全面的”。^④

虽然黄楠森先生卓有成效的探索对人性研究的启蒙至关重要,但如果在理解人性问题时,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作唯一依据的话,就会面临着片面性——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散见在时间跨度长达60年的全部著作中,许多文献资料尚在整理还未集结出版。根据不完善的文献资料不可能得到至臻的结论。其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存在着不精确的地方。这导致许多研究工作是在语言转换失真、失误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三,目前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专题论著,这使得对于经典著作的解说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尽管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但是,杨洪余却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这种贡献应当是实践的,即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去界定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看不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这种根本分歧,而将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误读。”^⑥

(二) “类哲学”的双重生命人性论

“类哲学”理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实际是一种“人哲学”或“人类哲学”,是立足于人的研究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对此,作为该理论的发轫者高清海先生说:“关于类的理论和哲学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完全一致的。”^⑦“类哲学”理论的特点在于:它立足却又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和论断。关于“类”、“类本质”、“类思维”,这些概念本出自于费尔巴哈,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其内容与含义进行了改造,而“类哲学”理论对马克思关于“类”的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类哲学”理论认为,以往研究人性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基本方法:一是把人性物化,二是把人性神化。把人性物化的理论有着生物进化论和哲学的庸俗唯物论的片面性。把人性神秘化的观点则由于

① 参见黄楠森《人学的足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

②③④ 参见黄楠森主编《人学原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8—181、164、17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⑥ 杨洪余《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重新解读》,《理论学刊》2005年10月。

⑦ 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将人视作与自然界无关的精灵式的为所欲为的自由存在,而完全切断了人与物质世界的天然关系。^①而类思维的方法则与上述不同:它要求“从生命本性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可能把人真正提升为‘人’”。^②这是以人本身的方式来理解人。同时“人来自于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如果不经相互分化和对立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类化’过程”。^③这就要求对人的现实性、物性根源及物质需要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有了然的理解。另外,当人进入自觉的“类”存在时,“人才开始称得上充分自觉了的获得自由的人”。^④这说明只有当人在本质上超越了物质自然时,才会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自主和自由,而这是人性中最为根本的东西。

关于人与哲学,“类哲学”理论主张,“要真正理解哲学,必须从人的生命这个‘本根’出发”,^⑤此外,还要克服单级本质论的片面性,要从矛盾分析二分法入手,这样就会看到人有二重生命——一是人的“种生命”,另外就是人的“类生命”。这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种生命。前一种生命决定了人被自然规律所支配的本能性生活,而后一种是追求理性价值的永恒性的生命,是超越本能的生活。人更有真意的是第二种生命。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会仅仅以活着为满足,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人活着是为了实现人的‘超生命’的本性”。^⑥这说明了相比于自然生命的有限性,人的自由生命是无限的,不仅有高低贵贱之分,还是可选择的。而在人的个体生命成长和人类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精神与自由的本性越来越成为人性主导的方面。

“类哲学”的许多理论主张与当时在我国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有关。以“类哲学”理论的重要作品《人就是“人”》为例,此书的题目一方面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⑦有着渊源,另一方面也与萨特提出的命题——“人就是人”^⑧完全重合。萨特正是用这个命题来反对唯物主义把人当作物的一个种类来看待的。“类哲学”理论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高成就,只能用这个时期的论断作为说明人和人性问题的依据。这就与其他理论,尤其是“经典根据论”的观点大相径庭。另外,该理论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历史局限性等问题,而且由于“类哲学”只讲人性变革支配历史进步,不讲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淡化阶级、国家、革命等唯物史观原则,这不仅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挑战,也差别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是,这种人性理论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它将人性视作为有着不同内在要素和生成过程的结构,不是把人性问题分析为不同的理论层次,而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就与“人性结构层次论”形成了互补。“类哲学”人性论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尝试,其意义不是在于提供了真理体系,而在于冲破了“教条和僵化,激活了智慧和想象力”,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来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 其他几种人性论

1. 文化人性论

上世纪80年代,国外优秀的学术成果开始被陆续引进国内,其中德国思想家卡西尔的《人论》和他的文化人类学思想就影响了当时我国的很多学者。像韩民青所著的《当代哲学人类学》4卷本,第1卷的标题就是“人类的本质:动物+文化”,明显是受到了《人论》的启发。韩民青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文化性逐渐克服动物性的历史。”^⑨他将文化区分为本能文化和自由文化,而自由文化的本质在于意识的发展,进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类的本质在意识”。^⑩他说“社会中的人

①⑤ 参见高清海、胡海波、贺来《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74、52页。

②③④⑥ 高清海《人就是“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62、263、1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⑧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⑨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1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⑩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4卷,第139页。

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本质而相互区别开来,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的不同,直接原因则在人们的社会意识的不同。”^①“把文化看做人的组成部分,这是唯物史观的一贯立场”,^②“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人,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乃应该是一种具有‘肉体+文化’结构的人”。^③此书也提出了人性三层次论:一是人的普通特性,二是人的主要特性,三是人的根本特性。主体性、自由性、理性、社会性、伦理性等是人的主要特性,而实践才是人的根本特性。^④

韩民青的文化人性论将对人性的解说与对人的发展和结局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人类最终将要创造和转化出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的特征是存在着四种亚类型的人:原生人、新生人、机器人和文化系统人。文化系统人将是“三个一体化”的人:人类与自然一体化,个体与群体一体化,意识与物质一体化。他的结论是:人类未来发展将从现在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将来会有多种存在形式,“人类‘极限’、‘变形人’、‘超人状态’实际上都可看做‘人类的结局’”。^⑤而人类的结局又是一个“事关宇宙结局的课题”,^⑥“新宇宙将具有质的新突破”,^⑦“人类所实现的更大飞跃,不再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有限飞跃”。^⑧韩民青提倡的这种创生、突变、转移式的发展理论,预示着人的起源、人类的进步等问题并非像生物进化论所说的那样简单,而是有着另外的可能。而事物的起源与本质密不可分,如果关于起源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那么,关于本质的观念也会随之变化。照此说来,则意味着我们目前的人性解说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人类其他形式不能适用。

韩民青在提出文化人性论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野蛮时期的人只关心物质需要,而现代社会的人则更关注科学与文化创造,而在此情况下,人性也确有转移式发展的趋势。另外,韩民青提出了对人类未来发展与结局问题的新认识,勾画出人类未来存在的四种可能形态,并进一步从自然与人达到统一的几种具体形态上,进行了一些实证科学式的思考。“文化人性论”理论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如果世界和人一直处于目前这种人类发展形态的低级阶段,那么从中不可能得到关于人性本质的深入理解。

2. 伦理本位人性论

休谟的《人性论》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也涌现出了不少关于人性论的著述,但在理论深度上都难以与之比肩。而王海明所著的《人性论》则可以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此书把人性研究划分为三个方面:“人性之事实如何”,“人性应该如何之标准”,“人性之应该如何”。^⑨关于人性,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人性是先验无条件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东西。第一,人有四级本性。人与一切存在物共有的属性是一级本性。人的生物特性是二级本性,这是生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的三级本性是人与一切动物共有的本性,这是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人的第四级本性是人所特有的那些属性。第二,人性可分为质与量两方面:质是那些所有人不可或缺,人先天固有的人之本质,而量则是在后天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变化可以选择的属性。比如仁爱之心,人皆有之,但多寡不同,这就是所谓性相近而习相远,是质相同而量不同的道理。质作为体,量作为用,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不能分离的。体用、质量的结构说明了人性的复杂,说明了特殊性与共同性、变与不变、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人性所有方面的研究绝不是一个学科所能胜任的,因此,王海明认为,应立足于最高层次的人性论——伦理学人性论的研究。“于是,所谓人性论,粗略看来,是研究人性的科学;精确讲来,则是关于人的一切伦理行为事实如何及其应该如何的优良道德总原则的科学;最终说来,则是关于优良道德总原则的科学,亦即关于善恶原则的科学:人性论的目的全在于确立优良道德总原则”。^⑩

①②③④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1卷,第265、276、277、80—81页。

⑤⑥⑦⑧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4卷,第18、44、46、46页。

⑨⑩ 王海明《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目录及30页。

王海明的《人性论》更像是一部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著述。此书是从人性出发来解决道德伦理领域中的问题,是一种伦理主义的人性论;而哲学人性论则是把人作为整体并置于各知识领域之上,来加深对人性的理解。前者是把对人性的确定理解作为出发点,而后者是把人性当作探而未明的难题。但是,对于书中的一些观点,笔者是表示赞同的。比如,人性论的研究不是仅限于一门科学,各个角度、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人性论。这说明了纯粹形而上学的人性论研究方法的破产。但是,如果因此说伦理学人性论是最高层次的人性论,这也值得商榷。照此说来,心理学、生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以各自的人性研究为人性论的最高层次,而实际上,是实践领域、理论需要的不同决定了哪一方面的人性会成为“最高层次”的研究对象。另外,王海明提出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①显然将人性视为了先验和抽象的东西。这虽克服了以往人性论和伦理学中排斥人性伦理的抽象普遍方面的片面,但如果只强调抽象普遍,而割裂具体特殊,那就是矫枉过正了。此外,王海明提出的生理本能层次的人性是主导人行为的基础,强调利己主义是前提等观点,都显得偏颇。但无论如何,伦理本位的人性论如同“类哲学”理论一样,其价值不在于提供了真理,而在于提供了破除对权威的迷信、独立思考的榜样。

3. 实践本质人性论

用实践的概念和理论来解答人性问题,这在当前我国哲学界是很普遍的。夏甄陶所著的《人是什么》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用“实践本质”来说明人性的人性论观点。书中对于“人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这样一系列追问:“人是何以存在的?”^②“人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③此书的主要思路是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先批判人性的各种宗教迷信、非科学假说,再从人的自然、心理意识、社会关系出发说明其存在形式与生存活动,并将之归结于实践,即“要认识人,除了通过人的活动特别是通过人的实践的感性的活动以外,别无其他途径”。^④最后,又以对实践的分析展开来说明人的起源、本质、活动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如果用实践来统一人的存在及本性的各个方面,那么就需要在实践的丰富具体内容中,探求其中最为根本性的一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循环的怪圈。但这种理论确有独辟蹊径之处。如夏甄陶提出了一种人性、人的存在和人性论无穷开放的思想:“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他不会停留于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人并没有一种绝对标准的所谓人的存在状况和绝对标准的所谓人的规定性。人的未完成,蕴含着可塑性和创造性,因而他总是处在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创造之中。”^⑤这一观点突破了以往关于人性的可定义论和绝对真理论。

二、关于我国当代人性讨论的思考

以上的分析讨论,引伸出了这样几个从更深层次制约着人们如何认识人性的理论问题:

1. 这些年我国关于人性的各种理论研究究竟是用新的话语形式讲陈词滥调,还是真的达到了理论的突破?
2. 可否设定有普遍客观的人性存在,只要有了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准确地把握,并完善地加以表达?
3. 应该把社会历史观看作是人性论的前提,还是反之,抑或视两者互为因果?
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人性的论断是否可以被超越?
5. 可否把人性论视作是理解人和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性问题?

① 王海明《人性论》,第9页。

②③④⑤ 夏甄陶《人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8、9页。

关于第一个问题。以上介绍了当代中国人性论研究的一些前沿成果。但是并非新的出版物就会蕴含新思想,实际上许多所谓“新”的作品和理论都是在重复,或用新的话语形式变相重复旧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古希腊神话里那个重复着向山顶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虽然辛苦劳作,却是徒劳无功。那么,我国当代的哲学家们关于人性问题的探索,是否也是在原地逡巡呢?

关于人类历史、哲学史的理解有乐观向上和悲观无为两种态度。如果我们是乐观的,相信人类有进步、相信哲学有进步的话,那就应该肯定关于人性本质的把握是在不断创新的。的确,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儒家理学的人性论,相比于改革开放前人性理论的一片凋零,我国当代哲学家的人性论探索达到了极高的理论水平。但由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落后于其他哲学文明发达国家,所以在理论上“重蹈覆辙”是不可避免的。从文化人性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西尔《人论》的影子;从“类哲学”人性论中可以嗅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气息;伦理本位人性论、实践本质人性论等理论都没有绝对地超越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人性论的“新探”的确是达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空前的“创新”,但是,相比于世界思想史上的相关成果,还称不上实质性的突破;而只有当中华民族人文理论的整体学术水平走在各民族前列的时候,人性论的真正“创新”才会实现。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人性的探讨有一个“人性可被定义”的逻辑设定。对此,国内的几种人性论研究理论看法各不相同,经典根据论、人性分层次论等理论对此表示赞同。“类哲学”的人性论和“实践本质人性论”不主张对人性做出封闭性的规定,所以实际上是在否定人性的可定义性。而“伦理人性论”则干脆认为对人性不能仅从一个学科来定义。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也认为没有可以作为先验普遍原则的人性规定。比如萨特,他的哲学代表性命题之一就是“人性论是没有的”。舍勒也在批判了各种关于人的定义之后下了断言:“迄今为止的有关人的学说错就错在企图在‘生命’和‘上帝’之间再嵌入一个固定阶段——可以定义为本质的‘人’。然而这一阶段纯属子虚乌有,人的本质之一正是不可定义性。”^①而一些后现代哲学家更是把人、主体、本质等概念看作是需要解构的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意欲完全取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但是,萨特先是反对给人做出规定——“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②继而又用“自由”来说明人——“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③舍勒同样在推翻了以往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所有规定后,提出“人的本质之一正是不可定义性”。^④实际上,这些看似取消“人性定义”的理论正是在一种新的解释原则之下重新思考人性。

许多哲学家设定有人性存在,这在逻辑上是必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本质和同一性,这决定了此事物不是彼事物,决定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人的存在亦然。但是,事物的本质和同一性都只有时空局限内的相对稳定,从时间和历史的意义上看,不仅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连人本身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结构也都处在不断的变革和创造之中。我们把握了当前人的存在和同一性,并不意味着理解了全部意义的人性。另外,简短的语言定义并不能将人性涵盖,所以“伦理本位人性论”才会主张,从不同的学科、学术角度出发来得到关于人性的规定。

一方面由于人们想要对人性做出普遍有效的规定而必然由此陷入片面性,另一方面人们却总是试图对人性达到更深层次和更为广泛意义的把握,这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对人性只能达到某种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了解,而那种超越历史的无条件性证明是永远无法企及的。相对的人性论有可能,绝对的人性论是不存在的。努力探求的同时,也要随时准备修正和放弃原来获得的结论。笔者以为,人性论所承担的根本理论任务不是去狭隘地把某个学科的人性规定上升为普遍有效于任何知识领域的“最高层次”,也不是去找寻某种抽象绝对的人性,而是要通过不断批判检验各种知识和真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来达到对人性不断深入的理解。那些明智的哲学家都是试图对人性做出一

①④ 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297页。

②③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6、11页。

些说明,但却否认这样的说明会普遍永恒地有效,更不会成为像数学、几何学中那样不证自明的公理。

关于第三个问题。社会历史观与人性论孰为前提,必然关涉到人性如何产生。人性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在先和逻辑在先的客观条件。如果从前者出发,就是先解答社会历史,然后推演出关于人性的结论。这是一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而“类哲学”的人性论则是把对人性的理解作为前提。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不过是人性的不断展开和完善的过程,只要我们解答了人性问题,就会得到所有关于社会历史的答案。这其实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方法论。那么,究竟是从人出发去研究社会历史还是从社会历史出发来研究人,这似乎成为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我们指引了新的理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以对人性本质的异化、对异化的扬弃,来说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而后又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来说明人性本质的异化和人类解放。“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①这里的私有制和异化(外化劳动)两个因素,一个是人性的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历史的因素,二者进入一种因果循环,哪个方面也不成为历史的和逻辑的在先的东西。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中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马克思用“实践”概念来消解两种方法论的对立,为解答人性论在先还是社会历史观在先留下了思考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被克服之后,在真正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当中,这两个对立的哲学思潮将会达到和解,并指出这将“是历史之谜的解答”。^③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个人类和每个个人都依赖于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在高级阶段则摆脱了对这两方面的依赖,获得了独立自由的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④也就是说“本质”与“存在”不是抽象无条件地舍此即彼,而是在时间历史的维度上逐步地此消彼长。在过去社会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是社会历史在支配人性,而在未来社会文明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后,则是人与人性支配和决定社会历史。由自然和社会历史孕育形成的人性最终会成为一种独立和自在的力量,成为自在自为的东西。但这个“自由王国”不是某个时间段能够完成的事业,而是一个永远向前推进的过程。与此相对应,真正彻底的哲学,将不再划分出人性论和历史观的边界而最终合二为一。

关于第四个问题。以上几种人性论理论,体现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不同态度:或完全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对此若即若离;抑或将其淡化,转而从别的理论资源出发来考虑人性问题。这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如果在人性研究中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唯一的理论资源,在学术上有没有合法性?

首先要明确,“背离”或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来研究人性问题是不能被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基础和主体取向代表了人间正义,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以劳动人民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和辩证批判的理论方法是任何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理论研究都不能背离和放弃的。虽然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关于人性的论断,有些话语采用了普遍必然的逻辑语态,但绝没有自命完成了关于人性的绝对真理,只是表明了探索人学问题的科学与辩证的态度。当然,如果只拘泥于马克思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6、500、1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断,而放弃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其他思想中的优秀成果,也是不明智的。例如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舍勒提倡的专门性人学研究就反映出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新带来的新理念。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另外,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伦理等社会科学理论的变革,以及以人道、人权、人类解放为宗旨的社会解放都只是刚刚起步。以彼时的文化背景出发,即便是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思想家也不可能把握到如今时代的人性现象。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研究所制定的原则和方法论不能被盲目抛弃,但也不必局限于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论断。对人性的研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进步文化的优秀成果加以互补才能与时俱进。

关于第五个问题。回顾西方哲学史中笛卡尔“我”论中的我、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统觉”、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精神”,都是指人而言的,都在探究人性问题。在现代哲学中,不同的哲学领域根据不同的实践需要考察人性问题,但无论视角如何,都会将其置于自己理论的核心地位。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家虽然提出要消解人、消解主体、消解本质论的形而上学等等,但究其实质,他们所要消解的只不过是关于人的各种片面观念,而不是人的问题本身。前苏联学者弗罗洛夫曾在《人的前景》一书的封面上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之谜了。”^①马克思同样把对人性本质的考察作为他的理论出发点。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实质是在批判人性本质的异化,而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幸福的构想实质是指向于人的本质及其外化需要获得满足。马克思早期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后期关于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的研究都是在讨论人性问题,而且是建立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对于人性的探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②

在当代哲学中,人性论已经凸显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解答其他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人是什么”实质是在诘问“人性是什么”,“人怎样发展”实质是在追问“人性怎样获得完善”。人的实践、理想等问题其中蕴含的内在根据还是人性。实践以理性需要和目的性为起点,以感性物质活动为中介,而以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创造为结果,这不过是人性本质的对象化而已。所以,一切对人的哲学研究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人性论这个前提而进行的。

(责任编辑:王丰年)

①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Human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e Unfolding of Human Nature

Wang He

The nature of human activities is fight and reconciliation driven by human nature for interest. Unity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at stand opposite each other lies at the core of human n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never determined by *ought to*. Rather, it finds its own possible ways. Such possibilities are decided by fights and reconciliations for interest among individual persons and interest groups as well, which shaped and dominated by human nature. Human history is indeed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such fights and reconciliations.

On the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China's Contemporary Humanity

Shen Yasheng, Yang Qi

Recently there are some representative approaches on this topic in China: the approach to study human nature based on Marxist classic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pproach on human nature, *dual aspects life* approach on human nature of *Human Species Philosophy*, culturalism approach on human nature, ethic-centralism approach on human nature, practicalism approach on human nat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dea on human nature and human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simple relation of mutual subordination, but also the relation of while one is growing, the other is declining. Finally, at present, we are supposed to take the issue of human nature as the fundamental one of all the issues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Theory of Wenqi (Literary Pneuma): Modern Interpretation and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Gu Mingdong

Literary pneuma (Wenqi) is a founda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but is an aesthetic thought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or an aesthetic theory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scourses on this aesthetic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a combined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physiology, psychology, aesthetics, textual analysis, and literary theory. It suggests that although Wenqi contain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its aesthetic rationale ha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for literature and art in general. By engaging in a two-way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heories, we can reconstruct this ancient theory into a new aesthetic which will provide insights for cross-cultural aesthetics. The theory of Wenqi is a self-contained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addresses how an artist acquires his personal identity, how identity theme is reflected in his literary works, and how it is perceiv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reader? The writer's personal pneuma pours into his creative writings and allows his writing to possess a special structure, a unified and complete form, a distinct style, etc.,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which constitutes the literary pneuma. The core of wenqi is the sensuous manifestation of the writer's self and his identity theme in his writings.

A Cornerstone of The Anglo-American Novel Theory: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Jiang Hui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has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ssays of the Anglo-American novel theor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lose reading to decode the cultural context that implicitly shapes the dialogic platform for James to develop his main ideas and launch his polemic arguments. To underst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theory all of sudden around 1884 in England, it is necessary to view the whole tradition that had impeded the emergence of such possibility. One of the illuminating and constructive features of James's article lies in its slow uncoiling out of old ideologies and foretells a new theoretical horizon to establish the novel writing as a work of art.

Research 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y: Response to Roy Porter

Yu Gengzhe

Chinese traditiona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was considered more valuable by Roy Porter etc. in the medical. Besides seeing a doctor, there were several ways for the sick to choose from, such as temple, witchcraft, cured himself or submitting to the will of heaven in ancient China. The upper and rich patients had the initiative to choose and test doctors, and the lower classes hadn't enough abilities to select doctors. So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a part of them and doctors were not responsible for universal health care.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other doctors and cater to the patients, doctors had to pay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curative effect, keep improving and have strong confidentiality ethos. As a result, this idealized doctor's training model could not pursue large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pharmaceutical. Traditional medicine was not ready for the efficiency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for lack of relevant theory, technology and staff. Ancient China had the similar hospital organization i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y,

(下转封三)